

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

朱汉民 著

南

於斯為盛



惟楚有材

道



湖南大学出版社

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

湖南大学出版社

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
YUELU SHUYUAN DE LISHI YU CHUANTONG

朱汉民 著

责任编辑：张明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 黄田 邮政信箱 410082)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长沙政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5印张 4插页 25千字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 000

ISBN 7—81053—025—9/G·4

定价：7.50元

序

在古城长沙、湘江西岸，有一片典雅、庄重的古建筑群，掩映在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山光水色之中，这就是为世人所瞩目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

当你离开喧嚣的都市，摆脱繁忙的工作与学习，徜徉于这千年庭院之中时，你定会被这古朴、清新、优美的环境所吸引。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这里更为珍贵的，是它闪烁的文化光彩和浓郁的文化气息。这里的每一组院落，每一间房舍，每一块石碑，甚至每一片砖瓦，都深含着隽永的文化品味。

岳麓书院创建于公元976年，历经千余载兴衰、变迁和发展，形成了特有的岳麓书院教育传统和人文传统。今天，当你跨入书院大门，能够从雅致、端肃的建筑群落中，感受到儒家士人严谨和闲适的读书生活，欣赏到他们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你会发现，“整齐严肃”的讲堂与“鸢飞鱼跃”的园林构成了一幅对照鲜明而又浑然一体的有趣画面，体现着古代士大夫“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当你站在朱熹亲笔手书的“诗碑”前，欣赏他那俊秀的书法和吟咏他那哲意深厚的诗句，你将仿佛回到八百多年前，看到了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那一次著名的会讲，朱熹和张栻正在为那精深的太极、心性、仁德等哲学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湖湘弟子们正环座聆听，思考“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的太极之体是如何奥妙；当你面对乾隆皇帝所赐“道南正脉”匾额时，你又会发现，原来隐藏在这绿云之中的书院，竟会是几千年正统儒家文化传递的驿站，那深厚而

又奥秘的“道统”、“心传”，从远古的尧舜传之于胸怀文化使命感的孔孟，再经一代有开拓精神的周、程、朱、张，使岳麓书院成为正统儒家文化在时代传递、空间传播的重镇。令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这一表面奥秘其实深厚的儒家“道统”，就是我们这颗星球上延续了几千年而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岳麓书院的历史文化不仅反映在其古老的石碑、匾额、对联以及古建筑群等历史文物之中，而且包融在那浩繁而发黄的典籍之中，体现在从古至今的许许多多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和行为方式之中。当金戈铁马的元兵攻打长沙，岳麓书院师生毅然放下书本，荷戈登城，在烟火弥漫的战场，与强悍的元兵展开激烈的肉搏，最后横尸于城墙，你可以从中发现岳麓书院文化；明清之际，衡阳湘西的石船山下，透出一缕微弱灯光，清瘦而精神的王船山在沉重地著述，胸中涌动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理”的激情，你可以从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感受到岳麓书院文化。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情怀里，你可以体验岳麓书院文化；从“中兴将相”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南征北伐、兴办洋务，以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的苦心中，你也可以发现岳麓书院文化；从唐才常的推崇实学、谭嗣同的《仁学》精神里，你同样会感受到岳麓书院历史文化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杨昌济的教育传统，毛泽东的湖南自修大学办学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中，尤其是湖南大学师生的求学态度、务实精神中，深切地感受到岳麓书院历史文化的勃勃生机！^①

如此丰富深厚、多彩多姿的岳麓书院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怎

① 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唐才常、杨昌济等均为岳麓书院学生，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学生，曾寓居岳麓书院学习。

能不激起我们崇高的敬意与深沉的思索！我不知道这本小册子，能否将岳麓书院的历史清晰地表述出来，将岳麓书院的文化传统确切地阐发出来。但是，我确有一个热忱的愿望，那就是能够和大家一同步入千年学府的历史长廊中，不仅是为了寻求辉煌，更是为了再创辉煌！

朱汉民

1996年3月

目 次

上 篇 历 史 篇

第一章	北宋创建	
一	文化名山.....	(2)
二	书院创建.....	(4)
三	四大书院.....	(9)
第二章	南宋鼎盛	
一	张栻主教	(12)
二	朱熹讲学.....	(16)
三	学风特色.....	(20)
四	宋末兴衰.....	(23)
第三章	元明延续	
一	元代重建.....	(26)
二	明代恢复.....	(28)
三	王学传播.....	(32)
四	明末师生.....	(35)
第四章	清代再兴	
一	省城书院.....	(39)
二	规制发展.....	(43)
三	经学传播.....	(47)
四	楚材斯盛.....	(49)

第五章 学制变革

- 一 高等学堂 (58)
- 二 高师、工专 (60)
- 三 湖南大学 (62)

下 篇 传 统 篇

第六章 教育传统

- 一 博于问学 (67)
- 二 明于睿思 (74)
- 三 笃于务实 (83)
- 四 志于成人 (94)

第七章 人文传统

- 一 社会本位 (101)
- 二 主体人格 (105)
- 三 义利之辨 (110)
- 四 爱国情操 (114)

附 录

- 岳麓名人萃言录 (121)
- 张栻：《岳麓书院记》 (139)
- 朱熹：《朱子书院教条》 (141)
- 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 (143)
- 王文清：《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 (144)
- 书院文化知识 (145)

- 后 记 (180)

● 上 篇

历史篇

岳麓书院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上的骄傲，她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培养了众多杰出的人才。所以，当我们今天徘徊在书院的讲堂、斋舍或轩栏的时候，总想从那一方方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副副对联中，去追寻它们的悠久历史。

纵览岳麓书院发展的辉煌历程，我们将会看到这所千年学府，如何从简陋的书院萌芽，发展为闻名天下的著名书院；如何从不闻书声的战火废墟中，一次又一次地再创辉煌；如何由一所古代书院，发展为一所现代大学。

希望这一趟千年学府的历史漫游，能够丰富我们的阅历，增长我们的知识，尤其是能够提升我们的精神。如果在这次历史漫游中，我们所获得的不仅是千年学府的历史传统，还能获得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的丰富知识；不仅是对我们身处的千年学府感到骄傲，更能对我们民族文化增强由衷的自豪感；不仅能增强对先贤们兴办人文教育、发展民族文化的景仰之情，尤其能激发起志愿成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进取精神，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第一章 北宋创建

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奠基时期。萌芽于唐代的书院教育，到了北宋开始形成一种独立于官学之外的独特教育组织，并涌现出不少闻名全国的书院。

岳麓书院就是北宋创建的一所著名书院。她建于有着幽美自然环境和深厚人文环境的岳麓山。岳麓书院创办后不久，就形成了包括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具有较大的办学规模，得到了宋真宗赐书赐额，并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书院”之一。

一 文化名山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岳麓书院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座落在湖南长沙优美的岳麓山下。

古人视岳麓山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是衡山之足，因而得名岳麓。主峰周围，前有凤凰、天马、玉屏诸山；后有桃花、绿峨诸岭；南有金盆、金牛诸峰；北有圭峰、云田等山。环抱起伏，气势磅礴，因而称之“高明广大，具岳之体。”

山灵虽奇，得人文而显。优美的风景，有待人们发现、开拓和经营。风景与文化有着互相影响促进的密切关系。岳麓山近市而不喧，林深而又宽敞，因而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名山多佛道，岳麓山早已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西晋以前，这里是道士修炼的“福地”。禹王碑下苍筤谷上有一处幽静的

“蟒蛇洞”，又名“抱黄洞”，^① 传言是当时道士修炼之处，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道教建筑。以后，传说有道士邓郁来此，“静息观中”，后“羽化仙去”。又传南朝刘宋元徽中（公元473—477年），有邓郁之和道士徐灵期到此，得梁武帝支持，在麓山置上、中、下三观作为修炼处，这些都说明当时岳麓山有相当规模的道教活动。

自西晋佛教传入、麓山寺创建以后，佛教势力日益发展。著名的“湘西二寺”之一的麓山寺（原名慧光寺），自西晋泰始四年（268年）创建，便是“禅灯不辍”。它比佛法传入三国东吴只晚二十多年，比南岳著名的福严寺早三百年。麓山寺为湖南最早的佛寺之一，故有“湖湘第一道场”之称。

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大书法家李邕写了著名的《麓山寺碑》，遗存至今，留下了可贵的史料，更能使岳麓山增辉。李邕（678—747年）工文善书，取法二王（羲之、献之），而自成一格，对后世影响较大。《麓山寺碑》为其代表作品，文词华茂，字体秀劲，加之刻工传神，因此人称“北海三绝”（因李邕曾官至北海太守，又称李北海），被广为传拓，视为珍物。

与麓山寺并称的道林寺，“起于六朝，盛于唐，闾于宋”。^② 隋唐时为律院，唐代名书法家欧阳询曾书写了“道林之寺”的门额，已有“道林三百众”之称。五代经楚王马殷重建，仍是“结构崇隆，廊院云连”，十分可观。“邻居尽金碧，一一梵王家”的诗句，真实描述了唐代麓山佛教的发展，已形成寺庵林立、殿阁相望的景象。

自晋以来，文士们寄寓隐居，游息读书，为麓山增添了光

① 西晋以前，道士张抱黄在此修炼成名，故原名抱黄洞。又说张抱黄是东晋宋齐时道士，难以确考。

② 参见宋赵抃《道林寺赋》。

彩，为开创书院创造了文化条件。晋代陶侃曾居麓山，“种杉结庵”，故名“杉庵”。其址就在书院之内，因此，后人追溯书院历史，往往不忘其开拓之功。杉庵久废，明弘治间曾建尊经阁于此。及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江总督陶澍复建“陶桓公杉庵”一间，并复制麓山寺碑于内，以为纪念。陶侃（259—334年），曾任都督荆交等八州军事，自西晋建兴三年（315年）常驻长沙，咸和四年（329年）被封为长沙郡公，死后葬于麓山南。陶侃勤慎吏职，常勉人珍惜光阴，因此，后人曾建惜阴书院，以纪念陶公，勉励学生。

唐将马燧（726—796年）曾建道林精舍于道林寺旁，作为文士活动的地方。当时亦有称道林精舍为“书院”的，因它是隐居读书之处，故也是儒家的活动阵地。可见，当时麓山的书院已萌芽了。

由上可知，岳麓山是一座儒、佛、道并起的文化名山。儒、佛、道之间的交流融合，为岳麓文化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岳麓书院的创办奠定了文化基础。当然，只是在岳麓书院创建后，作为文化名山的岳麓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儒学为中心的岳麓文化的新局面。

二 书院创建

书院是一种萌芽于唐、兴起于宋的新型教育组织。“书院”之名起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设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改名为集贤殿书院，是宫廷藏书、修书的地方，而非讲学授徒的场所。在《全唐诗》和各地方志中，散见记载的民间私人书院有近30所，其中大多属于个人隐居、治学读书之处，或是供祀纪念性书院，也没有授徒肄业的活动。其中少数书院虽具有讲学性质，如江西的皇寮书院、义门书院、福建的松州书院，但只是一种新型教育体制的萌芽。

书院制度真正形成，并普及为一种通行的教育体制是在宋代之初。书院之所以在这时蓬勃兴起，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唐末五代战乱，文教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政治稳定，生产发展，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士子们要求读书的愿望也十分强烈。北宋初，统治者虽也采取重文政策，但注意力用在发展科举上，对教育发展十分不力，宋初八十三年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萌芽于唐末五代的民间书院，这时因适应了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故得到了蓬勃发展。正如理学家朱熹所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成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①书院兴起后，就形成一种较稳定的教育体制，延续千年之久，遍布全国各地。

岳麓书院也是在宋初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的。但是，在书院正式创立前，这里已有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它是岳麓书院的前身。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战乱，文教遭到破坏，而湖南偏远，更为落后。智瓚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使士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岳麓书院就是在此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成。后来的士大夫们因书院的前身为和尚办学，不愿谈及此事，故这段历史不为人们重视，不载史志，久久湮没无闻。但是，南宋时期担任副山长的欧阳守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二位僧人的办学举措特加表彰，不因僧人所为而抹煞其办学功绩，可谓有识之见。

麓山在唐五代以前主要是宗教文化的中心，宋以后变为湖

^① 见《朱子文集》卷七十九。

南教育基地，湖湘儒学中心，其中必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儒佛势力的兴衰消长。士大夫们因僧人办学而“置之不道”，以致碑毁无存，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岳麓书院办学也体现了儒佛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和融合。僧人崇儒者之道而办学，说明儒学对其有深刻影响；而书院又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并吸取了禅林经验，反映出宗教对儒学的影响。儒佛之间的影响和融合客观上促进了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繁荣，特别是促进了书院本身的发展。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当时地方官学未兴，有识之士提出要在州治所在地长沙创办书院。由于麓山有幽静的环境和智璿的办学基础，是办学的理想地方。开宝九年（976年），在刘黯的倡议下，朱洞把僧人兴办的学校扩建为书院，此乃岳麓书院诞生，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文教基地。岳麓书院不是官学，但一开办就受到官府的支持和帮助，也表现出某些官办性质。而且后来历代重兴，也多由地方官员主持，形成了岳麓办学的一个传统和特点。岳麓书院在这个寺庙林立的地方得以稳定发展和延续，与此很有关系。

初创的岳麓书院继承了讲于堂、习于斋的古制，一开办就兴建了规模宏敞的讲堂、斋舍，当初共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作为书院的主体——讲学部分。以后岳麓书院规模不断扩大，居中开讲堂、东西序列为斋舍的格局一直保存至今。

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李允则，字垂范，从小以才略著称。他坚持以文教为为政之本。当时地方官学未建，岳麓书院因无人支持而冷落下来，他便决心从兴学岳麓开始，发展地方的文教事业。李允则经过一番调查清理，在旧院基础上加以扩建发展，建成了一所颇具规模、并形成基本规制的书院。

李允则还想进一步取得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

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年),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①的《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典籍。这是岳麓书院首次得到朝廷的赐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60余人,来学者显然不限此数,因而李允则又请允在湘江西岸增设湘西书院,反映了岳麓办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已经形成,以及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此后数百年,相沿因袭,继承发展,并为其他书院所仿效。

讲学部分是书院规制的首要内容,它包括讲堂和斋舍。讲堂是老师讲学论道的地方,斋舍除供学生住宿外,又是平时读书自习的场所。李允则扩建书院时确定了讲堂在书院的中心部位,以后书院屡有衰落和发展,中间设讲堂这一布局特点,始终未变。

藏书部分为书院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与书院的名称及由来有着密切的联系。书院在唐代主要指藏书、校书之地,到宋代形成教育机构时,它收藏图书典籍这一特点依然没有丢失。岳麓在智璪办学之时就曾“市之京师”,购买典籍。李允则扩建书院之前,所藏典籍荡然无存,他重新收集图书,又正式建立了藏书楼,并把国子监经书藏之于书楼。以后,岳麓书院又多次请得历代朝廷所颁经籍,藏书楼又有“藏经阁”、“尊经阁”、“御书楼”等名称,且大都安置在讲堂之后的中轴线上。藏书楼为书院的唯一楼阁建筑,显示书楼在书院的崇隆地位。

供祀部分也是书院的重要内容。宋以前的学校就有祀先师的祭祀活动,岳麓书院继承了学校祭祀这一传统。李允则扩建

^① 国子监又名国子学,是当时中央管理学校的机关,它本身又是中央官学。

时设置“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增建了颇为隆重的祭祀设置。以后，书院的祭祀很快发展为一种有特色的形式，它不仅供祀先师孔子，还供祀本学派的大师、有功于本书院的乡绅名宦，以及可供学习仿效的忠臣、学者。这样，书院的祭祀就发展为推崇学统、标榜学派，以及对学生进行道德、礼仪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岳麓书院后来增设的“诸贤祠”、“崇道祠”、“六君子堂”、“道乡祠”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又被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反映出书院的重要特色。李允则扩建岳麓书院奠定的基本规制，在全国书院中是比较早的，因而它又为其它书院所仿效。以后岳麓书院历时九百多年，规制的具体内容都有所演变和发展，但由这三个部分所组成的基本规制则相沿不变，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岳麓书院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也反映在其建筑的特点上。它以讲堂为中心而配以斋舍、礼殿、藏书阁等，组成我国传统的书院院落布局。李允则扩建岳麓书院，开创了岳麓办学的新局面，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禹偁的《潭州岳麓山书院记》称赞说：“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他把素称“南蛮”的湖湘地区，比作孔孟家乡的“洙泗”、“邹鲁”。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宋以后，经济文化的中心南移。首先是南方的经济发达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南方文化的发展也同书院的历史作用分不开。南方的书院数量多，规模大，它们在传播文化、繁荣学术、培养人才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贡献。王禹偁赞誉岳麓兴学后，使“潇湘为洙泗、荆蛮为邹鲁”，正是对岳麓书院促进南方文化发展和学术繁荣的历史功绩的肯定。以后，这里形成湖湘学术的

中心、高等教育的基地，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三 四大书院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他是见于岳麓书院史志记载的第一位山长。

山长即院长，是书院教学、行政的主持者。“山长”之名起于唐末五代。据《荆湘近事》载：“自五代蒋维东隐居南岳，聚徒讲学，授业者称曰山长。迄宋始以山长为学职，由帅司辟置，盖又为山长得名之始。”宋以后，书院大多沿用山长之名。从字义上讲，“山长”有山中长老的尊敬之意。因当时书院聘请掌教之人，大多是学行兼优、居山林而不仕的士大夫，加之书院多依山林、择胜地而建，故有此名。

周式，湘阴人，史称其“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撰有《毛诗笺注辨误》八卷，《论语集解辨惑》十卷，《拾遗》一卷，是一个研究笺注训诂的经学家。他主持书院后，感到原来的院舍不能适应士子纷纷前来就学的需要，故请太守刘师道扩建岳麓书院斋舍。

周式任山长期间，是岳麓书院在北宋最繁荣的阶段。据朱熹《南岳处士吴君行状》所载：“长沙故有岳麓书院，国初时，郡人周式为山长，教授数百人。”^①周式主院，很快就发展到教授数百人，可见当时的办学规模已大大扩展。

周式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故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真宗对岳麓书院尤为关注。早在咸平四年（1001年），即颁给岳麓诸经书，批准在湘江西岸别建湘西书院。祥符八年，又亲自在便殿召见周式。北宋书院虽多受朝廷赐书赐额，但由皇帝专门召见书院山长却是少见的。可见

^① 见《朱子文集》卷九十七。